

第一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历史条件、历史和现实的根据，为我们深入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原因指明了方向。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学说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

本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其直接思想来源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其晚年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经验和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发生根本改变的认识成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当然，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万世不变的教条，采取机械地生搬硬套的办法，也不能停留在其原有的结论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①一“不能丢”二“搞清楚”这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贯原则立场。所谓“不能丢”，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既不能动摇其指导地位，也不能背离其基本原理。所谓“搞清楚”，就是要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和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列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一场全新的社会实践，有许多我们原来没有碰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去解决。为了指导这场事业走向胜利，邓小平同志坚持一“不能丢”、二“搞清楚”的原则，把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无限地贴近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及时地回答现

实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原则，使之成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钥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什么是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必须弄清楚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原理，总结长期以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经过多年的不懈的探索、深邃的思考，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这一概括科学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认清我国的国情、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30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指出，我国社会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这一科学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理论，以及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成果。他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作为理论依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在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

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这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关于社会革命论的新发展，它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综上所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既继承了前人，又有了新的创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为其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果看不到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就有可能把这一理论看作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看不清其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甚至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对立起来；另一种可能是贬低这一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不承认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不承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不承认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实现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它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既形成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

论观点，也提出了不少错误的论点；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沉痛的教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以及指导这一事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继承和坚持那些成功的建设成就及其理论成果、实践经验，同时纠正和借鉴那些错误的实践及其理论失误、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直接借鉴作用的成功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主要有：

1.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这就是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论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的思想。

2.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的理论。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中共八大正确地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5.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我国社会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用 10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

6. 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发展商品生产，要遵守而不能违背价值规律的观点，意识形态领域内要贯彻“双百方针”的主张，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不能照抄照搬的观点，在民族工作中要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等。

上述这些富有创造精神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观点，是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辟了最初的航道，并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但很可惜，这些正确的东西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取得深刻的共识，并牢固地确立起来、一贯地坚持下去，同时这些东西还不够系统、不够完善和成熟，有些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1957 年 6 月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大起大落，在坎坷曲折中缓慢前进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挫折和失败、迷误和偏颇。这些错误及其教训大致可分为经济建设领域和思想政治领域两方面。

1. 经济建设领域。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盲目求纯、急于过渡，发展生产力方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这些错误集中表现于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时期。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以为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盲目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三大改造完成后，农村的高级社刚刚建立起来，还没有得到巩固就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名为“一大二公”实为“一平二调”，搞什么吃饭不要钱、“八包、十包”。进而刮起一股“共产风”，企图在一个早上实现共产主义。甚至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也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因

为党中央有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1958年10月，山东有一个县提出了大战二百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同年10月，湖北有一个乡党委书记竟然向群众宣布，当年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则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时。发展生产力方面，主要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以为单凭主观愿望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1958年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以钢产量的翻番为主要标志的所谓“高速度”、“高指标”。为了实现1958年的钢产量比前一年翻一番、1959年再次翻一番的目标，采取了全民炼钢、让小高炉遍地开花的办法。与此同时，又吹起了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当时提出的口号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8年9月，《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广西一个农业社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高产喜报”。这种脱离实际的盲目蛮干，当然要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

另外，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能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我们还曾经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经济建设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反对。由此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僵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2. 政治思想领域。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最后发展成为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先后犯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9年“反右倾”斗争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全局性错误等。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面对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复杂情况，毛泽东同志作出错误的判断，人为地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接连提出了错误的理论观点。1957年10月，他否定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9月，他又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5年1月，他进一步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错误的概念，并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概括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阶级斗争上升为各项工作的纲。“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是全面推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严重地混淆是非、颠倒敌我关系，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至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否定和纠正了上述经济领域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左”倾错误，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肯定了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检讨历史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注意吸收那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更主要的是尖锐地批评错误，深入地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以此为戒。他曾严肃指出，1957年后的20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①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他还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这就不仅帮助我们认识了错误的严

重性，而且使我们抓住了错误的要害所在。在严肃的反思过程中，邓小平始终着眼于开辟未来，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思考、冷静分析、深入论证。他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在“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谬论中，他紧紧抓住“四人帮”讲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这句话，反复阐明社会主义不是穷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由于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如此科学深刻的历史反思与总结，建国 30 年来积累的那些历史经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反证功效。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②这样，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根据。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的现实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在这崭新的社会实践中，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逐步形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4~235 页。

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勇敢地向“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旧经济体制发起冲击，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各地农民纷纷学习、仿效。这时，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它代表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充分尊重农民的愿望，排除“左”的干扰，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的大胆行动。1979年起，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之不断完善，得到健康发展。由此，中国农村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村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把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加以解决。在这过程中，我们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改革道路，一方面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长期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重大体制问题，使传统的农村经济摆脱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困境，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重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民致富，逐步实现农村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改革在农村取得突破性成功后，邓小平同志又及时地总结经验，不失时机地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说出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突破，是与我国前几年的改革实践直接相关的，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逐步被打破，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价值规律日益覆盖全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商

品经济意识大大加强。许多人，甚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民也纷纷从传统的重农轻商的农本意识中解放出来，勇敢地投入到商品经济的海洋之中，学会了通过商品竞争发家致富的本领。对这一点无需举很多例子，只要看一看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朝鲜族风味餐厅，维吾尔族烤羊肉串就完全可以明白了。这种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为我们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与可能。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①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铺开的新阶段，改革在各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进一步发展，国营企业内部的改革更加深化，国家计划管理体制有新的改革举措。另外，国家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同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双重价格体系的矛盾，条块分割、分配不公的现象等。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尤为突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新旧体制并存状况引起的严重的体制摩擦；二是传统理论观念的困扰，主要是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能不能有一个新的突破，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就在这时，善于把握问题的关键环节的邓小平同志又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早在1979年11月，他在与外宾的谈话中第一次用肯定的语言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并断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987年2月，他再次尖锐地提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他在这里已经突破了将计划经济归为社会主义特征的传统理论模式。从1990年底开始，尤其是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围绕市场经济问题发表了多次谈话，对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使我们全党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同认识，为十四大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上面我们考察了改革从起步到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简要过程。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不清楚到清楚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各族人民绚丽多彩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一切着眼于实践的原则，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和引导各族群众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善于把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加以概括总结，把它加工提炼成指导全国工作的重要决策，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并指导了这一伟大实践。历史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导，伟大的理论又产生于伟大实践。如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果没有这一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样，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实践、伟大创造、伟大智慧，这一理论就不可能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料和强大动力。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理论思维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巨大源泉。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结束。这场战争，使世界格局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这时，美国挑起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与军事威胁。随后以苏联为核心的“华沙条约组织”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这是冷战加剧的直接产物。后来，两大阵营的对垒逐步演变成美苏两霸的对峙，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军备竞赛，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互相把导弹指向对方，不断挑起局部战争，使世界长期不得安宁。这种冷战状态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

进入70年代后，由于苏联在争霸世界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则在长期的冷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政府被迫

决定改变其对外政策，提出了在“五大中心（美国、苏联、中国、西欧、日本）中搞均势外交，以缓和代替冷战，以谈判代替对抗的策略。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动，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制定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在周恩来同志的协助下开展灵活有效的外交活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地位，先后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对改变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过去，我们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存在着某些偏差，主要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由此制定实施了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和“山、散、洞”的方针。

进入 80 年代后尤其是 90 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剧烈、最为深刻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等。在新的世界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从世界战略，从全人类利益的高度，经过多年的冷静观察、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从此，战争与革命便成了世界的主题。70 年代以来，世界主题开始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变化，至 80 年代形成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新的主题。对此，邓小平在 1985 年 3 月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①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抓住了诸多国际矛盾中最主要的两大矛盾，概括了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半个世纪中，世界和平力量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5 页。

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制止战争的因素大大加强。其中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另外第二世界人民，甚至美苏两国的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再加上美苏力量相对削弱、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等制约战争的诸多因素，战争的危險大大减弱。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是，各种不稳定因素仍大量存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宗教纠纷突出起来，不断酿成流血冲突与局部战争。国际形势仍动荡不定，尤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主要障碍。和平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发展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少数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南北问题的形成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 100 多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相继获得独立，但西方国家利用它们对世界商品、金融、技术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及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仍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控制与剥削。据不完全统计，80 年代以来由于偿还债务、贸易条件恶化、初级产品价格暴跌、西方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收入损失，再加上支付投资利润和技术转让费、资金外逃、人才外流等原因，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每年高达 5 千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发展资源每年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因此南北之间穷的愈穷，富的愈富的鸿沟越来越加深，二者之间的差距已从 60 年代的 30 倍上升到 90 年代初的 90 倍。70 年代以来，要求根本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总之，“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3、353 页。

2. 世界格局趋向于多极化

随着东欧剧变与苏联的解体，以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对峙，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已告终结，各种力量正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它的综合国力、世界经济地位均相对下降，它想独霸世界、充当“世界警察”已力不从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均大大下降，但它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工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无论从现实和将来看，它终将恢复其大国地位，成为世界性强国。德国和日本是两个正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其中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第二大债权国，拥有足以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雄厚财力和科技实力。日本是世界上头号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其人均产值已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目前，日德两国正抓住各种有利时机，企图在国际舞台上重整旗鼓，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中国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势力还不很强，但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在国际事务和维护世界和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也算一极。”^① 总之，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它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任务。

3. 综合国力的竞争已成为国际较量的主战场

随着东西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日益向经济领域倾斜，国际间政治力量的消长主要是靠经济和科技实力而不是靠军事实力来决定。这样，在国际竞争中经济及科技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它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3 页。

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谁的综合国力强谁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否则就会受冷落、受排斥、受制于人，甚至遭到打击。综合国力将决定各主要国家在 21 世纪的地位和座次，也将成为世界新格局的主要支点。因此，各国都在专注于国内问题的解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努力把本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拉开序幕。对此，早在 1985 年邓小平就指出：“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① 他一再强调要集中精力把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上去，并把“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他又严肃地告诫我们，“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②

4. 世界经济趋向于一体化、集团化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日益超出国界，呈现出经济生活国际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现在，这种趋势已经超出一般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进入了直接的国际化大生产的新阶段，各国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更加密切，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高，世界范围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全球性的信息网络日益现代化。这样，每个国家都成了世界经济的一部分，都要受到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必须把本国的经济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实行开放的政策，谁也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一花独放、一枝独秀。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7、242 页。